

BOOKS

A GUIDE TO BOOK PUBLISHING

图书出版指南

〔美〕达塔斯·史密斯 著

彭松建 赵学范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指南

(修订版)

[美] 达塔斯·史密斯 著
彭松建 赵学范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出版指南/[美]达塔斯·史密斯(Datus C. Smith, Jr.)著;彭松建,赵学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书名原文:A Guide to Book Publishing

ISBN 7-301-02177-1

I. 图…

I. ①D. C. 史…②彭…③赵…

Ⅱ. 出版工作-图书

N. G231-62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校内,邮政编码:100871)

排印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50千字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4.50元

A Guide to Book Publishing
Revised Edition
by Datus C. Smith, Jr.
Revised Edition Copyright ©
b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U. S. A.

本书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出版指南》1989年英文(修订)版翻译。

谨向免费向我社提供本书中文版版权的作者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致谢。

中译本序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图书出版指南》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阵阵馨香。本书是美国出版家达塔斯·史密斯的力作，是他对图书出版业运营机制的概括和经营管理出版社的实际经验的总结。本书并无高深的理论，却实实在在地介绍了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和版权诸方面的实际运营知识和操作方法，无不给人以启迪和启示。

在阅读和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仔细研讨书中的内容，我们体察到作者对图书出版业运营业务之精深造诣，体察到本书对编辑、出版、发行和版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介绍和评述之系统和详尽，从而有益于去思考、分析和研讨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力争使我们编辑出版的图书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可能会起到“思维驱动器”的作用。

本书作者是美国出版界和文化界颇富盛名的出版家达塔斯·史密斯(Datas Smith, 1907—)。他曾是美国大学出版界的领导者之一，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工作，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和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主席；他也从事过一些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的工作，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图书出版业，例如他曾组织过《亚洲历史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除了这本《图书出版指南》外，还著述有《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和土地》等书。

—

达塔斯·史密斯的《图书出版指南》一书，用较为简洁的语言阐述了整个出版产业运营的各个方面，其主要部分是围绕编辑部

(1)

筛选选题和加工书稿、图书出版过程、促销和发行以及版权问题这 5 个重要环节展开的；当然也分析了出版者和作者、印刷厂商、销售书商、图书馆工作者以及教育工作者之间的种种联系和往来；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发行的投资与经济效益的问题，作者格外重视。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成本与效益的分析，从编辑发现和构思选题开始，到把一册一册新书销售到读者手中，都要讲究估算成本，节省成本，多创效益，增加收入。对于出版业的投资和经济效益的问题，作者称为出版经济学的诸方面，本书予以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教科书和儿童读物、青少年读物的出版问题、翻译作品的版权和版税问题等，作者也给予一定篇幅，辟专章逐一加以阐述。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且系统详尽，除了上面列举的各项课题之外，还对图书俱乐部、大量发行、图书零售以及出版社的财会工作等方面都加以介绍和说明。

人们常说，出版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编辑是基础，出版、财会是保证，发行是关键，选题是生命线。这些程序密切相连，各个环节紧紧相扣，缺少一道程序或者一个环节，整个工程就难以灵活运转，调节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作者正是把握了出版产业的这一特征，分 5 大部分来阐述整个出版产业的运营机制。这 5 个部分是：(1)图书出版业和国家的发展，(2)图书的出版过程，(3)图书出版业的种类，(4)为未来的发展而建设，(5)专门课题。

二

图书和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从人类在劳动和交往过程中创造了文字，就开始了原始的出版工作，尽管那时人们只会把字刻在竹片上、骨头上或石片上。由此可见，图书出版业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又不断前进的事业。

然而，从古到今，图书出版业的产值在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

只占较小的份额。虽然,发达国家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较快,人均拥有图书的数量较多,但是,以货币数值来衡量,图书出版业的产值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产值相比较,仍然是较小的。至于发展中国家,图书出版业更是一个小的产业部门。

图书出版业的产值小,是否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或可有可无呢?!本书作者的回答富于哲理和启示。他指出,正像一个能启动并控制一架巨大机器运行的一个小小开关一样,图书出版业是国家发展的一把“钥匙”。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对于该国的教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也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素质。他还说:“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投资,而图书是教育的基本工具。”(见本书第3页)

我认为,达塔斯·史密斯的这些观点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本书作者从整个国家发展的利益出发,来观察和论述图书出版业的种种问题,并把这个问题放在本书的首位(第一部分),冠以“图书出版业和国家发展”的标题。作者不是就出版论出版,而是从宏观角度,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高度,来思考图书出版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考察图书出版业与社会、经济、教育之间的关系,观察和展望图书出版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当今的中国,全国上下一齐奋进,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图书出版业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加工产业;出版社(公司)是知识、信息制作和加工的企业,也称为文化、信息经营企业,作者源源不断地向出版社提供各种各样的书稿,出版社则组织编辑、出版、印刷等方面的人员对书稿进行加工、制作,使之成为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一册册的图书。图书、报刊或电子出版物等是知识、科学技术和信息的载体。图书又是具有教育功能、文化积累功能和供人们欣赏品味的商品。各种出版物对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起着巨大的制动作

用。同样,图书出版业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应当十分看重图书出版业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和制动作用,切不可等闲视之或置之不顾。众所周知,图书传播知识、传播科学技术和信息,启迪思维,开拓智力,教育读者,特别是教育青少年,有益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的道德水准。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增强,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的和现实的推动作用。凡是想着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仁人志士,无不重视图书出版业,无不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所以,努力向国家领导机关和决策人提建议,向各界人士做宣传,向广大群众做宣传,从而提高对图书出版业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认识,大力发展图书出版业,增强图书的教育功能,启迪智力,利民强国,使中华民族以更高的文化教育素养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书作者达塔斯·史密斯试图给予读者的主要信条是:每个国家的图书出版业都应闯出一条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见本书第9—10页)。的确,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各国都有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点,图书出版业会深深地烙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烙印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各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不可能按照某一种模式,也不可能照抄照搬某一个国家的发展体制和经验,而只能走各具本国特色的道路。然而,这并不是说,各国图书出版业毫无共同之处,特别是在经营管理方面没有普遍适用的原理和原则。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尽管《图书出版指南》的许多内容是依据私营的图书出版企业体制而表述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也可以加以适当的运用和参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体制,这两种体制在所有制

结构、价值判断和追求目标诸方面确实不同。但是,一个机智和有才干的职业出版家,仍然可以从本书中找出许多有益的因素,尤其是涉及图书出版业的经营管理之道诸因素更是可以借鉴的。

本书阐述的内容是图书出版业所面临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的原理原则也是一些带共性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阅读和使用本书时,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思考、去分析、去鉴别,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从总体上来说,本书作者是为刚刚步入图书出版生涯的人们而写作的,因而,本书所介绍和评述的图书出版业的一些原则、经营战略和运营操作方法都是不难理解的。

本书作者十分重视出版社的组稿工作,称其为“编辑开拓”。他指出,编辑坐等作者和译者送稿上门是不可取的,也不会带来好的效益。因此,他主张必须走出去组稿,开拓书稿选题。编辑开拓书稿选题,在整个出版工作中具有战略地位,因此,编辑人员,特别是组稿编辑,应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远见卓识,能从战略高度来思考选题的价值。选题,即编辑开拓,是整个出版工作的基础。“书稿是构成图书出版业中各个环节的基础”(见本书第40页)。同时,在提出书稿选题计划的过程中,切忌仅仅依赖编辑个人闭门造车,冥思苦想;而是应该走出去,征询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与机智的编辑和有经验的掌握市场信息的发行销售人员共同商讨,进行必要的论证和成本估算,等等。提出选题之始,要注意研究图书市场的情况,研究现有图书的选题与发行情况,研究读者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可能的需求。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编辑人员应该特别注意研究市场状况——研究哪类图书是顾客真正需要的”(见本书第166页)。

《图书出版指南》一书十分强调成本和效益分析。作者除专辟第3章“图书出版经济学”之外,几乎每一章都谈到相关项目的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其中特别强调编辑人员学会算账,学会计算成本。我们中国的各家出版社的编辑,近些年来已开始学习如何估算图书生产的各项成本。随着我国的图书出版业更多走向市场,受市场经济法则的调节,测算图书生产的成本与收益日渐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学习,需要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为了学习成本与效益分析方法,我们不妨仔细地研读《图书出版指南》的有关章节,思考和总结我们的经验,以利于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

图书出版之后,从出版社来说,如何利用各种渠道把书送到读者手中,这是发展图书出版业的关键。达塔斯·史密斯花了很大功夫和很多篇幅来介绍图书的促销和销售。作者指出,促销是图书出版业的一块阵地,也是出版者对已出版的每一种图书应负的一种职责。促销,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告知各方人士,某一种书已经出版,千方百计去启发和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以期又快又好地推销更多的图书。

促销,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图书宣传工作。然而,本书介绍的促销方法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图书宣传方法。图书宣传只是促销的一种方法。我们不妨借鉴本书介绍的6种促销方式和方法,来加强我们的图书促销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图书市场的形成与扩大,促销工作的重要性日渐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可能出现某些不正当的和健康的促销活动,有的人不择手段地推销某些健康的或不健康的图书。甚至有的人超出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或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这些是任何一个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者和书商应予唾弃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出版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守法经营的概念,遵守正常的市场运营规则,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不要忽视本书的附录“版权、许可证和侵犯版权”一文。该文放在本书末尾,但却极端重要,特别是对刚刚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我国来说,作为中国的出版工作者,认真读一读不无益处。

“版权、许可证和侵犯版权”一文不仅回顾了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且介绍了当前国际版权事务的状况和国际版权运转中的争论和问题。其中“版权和发展中国家”一节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发达国家的著作及版权转让中如何力争使得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公司进行版权转让的谈判过程中,特别是我们试图购买国外著作的版权时,要学会而且善于运用国际版权组织的有关规定和法案(如巴黎法案),以便保护自己,为我所用,注重效益,发展我国的图书出版业。

出版社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从西方市场经济角度做了一些阐述。作者几次提出要“制造读者”,要支持和帮助发展图书馆事业,为扩大图书市场,扩大并开发潜在的读者群,做一些奠定基础的工作。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洞察是深远的。

四

我们在翻译和校订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发现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发展中国家图书出版业的介绍和评述方面未免带有某种偏颇和不够公正之处。但是,为了保持该书英文版的原貌,我们在翻译时未做任何改动和删节,敬请各位读者注意作者的身份。达塔斯·史密斯作为一个美国出版家,尽管他对发展中国家图书出版业怀有同情之心,然而却不会完全了解和理解发展中国家图书出版业的处境和困难。

在此,我们要提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几位同行,他们对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一定的支持。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副社长理查德·巴登(Richard P. Barden)先生和总编辑奈欧米·帕斯卡尔

(Naomi B. Pascal)女士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蒙塔吉斯·伊恩(Montagnes Ian)先生。1991年7—8月间,奈欧米·帕斯卡尔女士和蒙塔吉斯·伊恩先生先后应邀来华讲学,他们使用的教材就是这本《图书出版指南》。然而,决定翻译这本书并不是出自他们的建议。1989年秋,本书译者之一,赵学范女士(北京大学出版社化生地编辑室主任,副编审),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访问,并由该社悉心安排参加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AAUP)于1989年10月29—3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东北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年会,与会期间结识了奈欧米·帕斯卡尔女士。经她介绍,理查德·巴登先生热情地向赵学范女士推荐了《图书出版指南》。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12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同意北京大学出版社免费享有《图书出版指南》中文版的出版发行权。在本书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们仅向这几位朋友,尤其是理查德·巴登先生对此书中文版所给予的密切关注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第1章至第8章由赵学范翻译;第9章至第21章由彭松建翻译,并承担全书校订。为了便于出版业同仁更好地使用本书,我们对原书索引做了补充、分类,编制成现在的“汉英对照分类索引”。本书翻译和校订经历了较长时间,但因译者水平有限,误译和分类不当之处,谨请出版业同行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彭松建

1992年6月21日
于北京大学西馆

有关本书的设计

没有一个人只从读一本书里就能学到图书出版业务，只能通过实践掌握它。本书介绍的出版者遍及世界各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凭借书中提供的方法，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们的成功除了依靠其智慧、精力和不太多的资本外，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他们的成功应该对那些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刚刚开始步入出版生涯的人们以信心和鼓舞。本书就是专为他们写的。

本书仅阐述图书出版业的一般原理，并列出版者依此途径将学到的内容。尽管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一般原理都差不多相同，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图书出版业所服务的社会，其教育、社会和经济条件毕竟不尽相同。对本书恰如其分的评价可能是：本书试图列出在广义上可能适用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图书出版业中一些普遍现象——这是可能的，即正如人们在全世界发展中地区所看到的。人们会考虑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尤其是适合于各国家读者的需要。

正如第 21 章所指出的，书中介绍了在一些国家行之有效的培训课程，还推荐了许多有关图书出版业的书籍。尽管所有这些方面都集中于是否具备有复杂的出版及印刷工业的社会条件，但对于期待研究一般问题中的某些特殊领域的读者而言，本书可能是有价值的。书中的许多章节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些课题。其他资料，包括与编目学有关的内容，也详尽介绍其有用的部分。

本书编者所给予读者的主要信条是，每个国家的图书出版业

都应闯出一条适合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从对其他国家出版业的观察中获得启发；这些观察本身是有益的，并以此作为启迪我们思路的“思维驱动器”。但是，对我们最终的检验在于我们做些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仅仅是提供了一台“思维驱动器”而已，而不可将其视为放之任何国家而皆准之处方。

致 谢

首先,应感谢我早先在富兰克林图书项目(Franklin Book Programs)的同事们,他们的共同努力首先是本书得以产生的最重要的因素。富兰克林是一个不盈利的国际图书开发组织,并且他们意识到需要有一本简单明了的手册,以供发展中国家开创图书出版业的人们使用。没有这些先驱者们的基础工作,本书的修订再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本文后面增加了需要致谢的各国朋友的新名单,他们为本书的第一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我还希望重申第一版中对福特基金会的致谢,他们对富兰克林项目给予慷慨的支持,包括对事实的收集和本书写作的支持。

对本书有主要贡献的首推奈欧米·帕斯卡尔(Naomi B. Pascal)女士,华盛顿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的总编辑。她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一个编辑的常规职责范围。除了承担零星的增补润饰、纠正作者的许多错误、宽容地接受作者重新考虑而得出的意见外,她还是几位社外专家的组织者,由于这些专家提供的大量帮助,这本问世 22 年之久的图书(指距 1966 年的第一版——译者)才得以提高到目前的学术水准。没有奈欧米·帕斯卡尔切切实实的专业性工作,我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接着应提到蒙塔吉斯·伊恩(Montagnes Ian),多伦多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的总编辑,曾任《学术出版》杂志编辑多年,目前任职于菲律宾的洛杉班诺斯(Los Baños, Philippines)国际水稻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

stitute)的编辑培训课程主任(参加者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希望能卷首献辞页记载下他卓著的国际性贡献。他的这一贡献无论对于我或于此书都是十分突出的。从他寄给我的几封信和数十页备忘录中,我能推测出他如此慷慨地为我花费了多少时间。而且我还确信,他一定会说,在洛杉班诺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会教会他许多东西,这些内容反映在整个修订过程里他给予我的历次建议中。

还有许多其他各国朋友,他们提供了许多我很珍视的批评和建议。他们之中有:阿马迪奥·阿博尔达(Amadio Arboleda),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东京(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and Asian Cultural Centre for Unesco, Tokyo);埃德瓦德·阿斯拉肯森(Edvard Aslaksen),大学出版社组织和国际学术出版者协会,奥斯陆(Universitetsforlaget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ly Publishers, Oslo);伯登德·班克尔(S. Bodunde Bankole),拉哥斯大学出版社,尼日利亚(the University of Lagos Press, Nigeria);朱利安·贝尔斯托克(Julian Behrstock),巴黎(Paris);马克·卡罗尔(Mark Carrol),乔治·梅森大学出版社(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学术出版物编辑;伊丽莎白·盖泽(Elizabeth Geiser),盖尔研究公司,纽约(Gale Research Co., New York);保罗·格利森(Paul Gleason),国际货币基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 C.);钱德勒·格兰尼斯(Chandler Grannis),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切斯劳尔·简·格里兹(Czeslaw Jan Grycz),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西比尔·贾古什(Sybille Jagusch),美国国会图书馆儿童文学分部(Children's Literature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梅·卡曾(May Katzen),莱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杰里·兰姆(Jerry Lamme),亚特兰大(Atlanta);玛

(12)

西娅·洛德(Marcia Lor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Unesco, Paris);罗伯特·麦克马金(Robert MacMakin),国际发展机构前代理人,莱索托(formely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esotho);赫伯特·莫顿(Herbert Morton),美国研究社团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桑德拉·保罗(Sandra K. Paul),纽约(New York);莫汉·普里姆拉尼(Mohan Primlani),新德里(New Delhi);路易·雷耶斯(Louie O. Reyes),马尼拉(Manila);哈桑·沙迪利(Hassan Shadily),雅加达(Jakarta);特盖什瓦·辛夫(Tejeshwar Singh),新德里(New Delhi)。

除了前面提到的奈欧米·帕斯卡尔女士外,我还想对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其他人表示深切的感谢,尤其是管理副社长理查德·巴登(Richard P. Barden),他不仅建议他们出版社承担此书的出版,而且亲自负责经管这一项目。他曾在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任职,因而他深深了解国际出版业的需要;不仅如此,他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版者的友谊对于此书的经销也是极为可贵的。我同样非常感谢出版部主任弗欧尼卡·赛德(Veronica Seyd),他提出了有关采用现代印刷技术的有价值的建议;还有擅长于市场销售的帕特·索登(Pat Soden),也有效地发挥了类似作用;主任编辑朱利德塔·塔弗(Julidta Tarver)和莱拉·夏博尼奥(Leila Charbonneau)十分胜任书稿编辑的重要角色,赋予本书独特的风格;经营部经理兼国际学术出版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ly Publishers)秘书多萝西·安东尼(Dorothy Anthony),当然还有出版社社长唐纳德·埃勒古德(Donald Ellegood),在他的领导下,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已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全美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之一。能加入这样一个卓著的出版社的作者队伍,我感到由衷的荣幸。

在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中为本书第一版的问世做出贡献的人还有:阿富汗的阿蒂柯尔·帕朱瓦柯(Atiqullah Pazhwak),罗伯